

英山革命史資料

第五輯

中共英山縣委
史志編研室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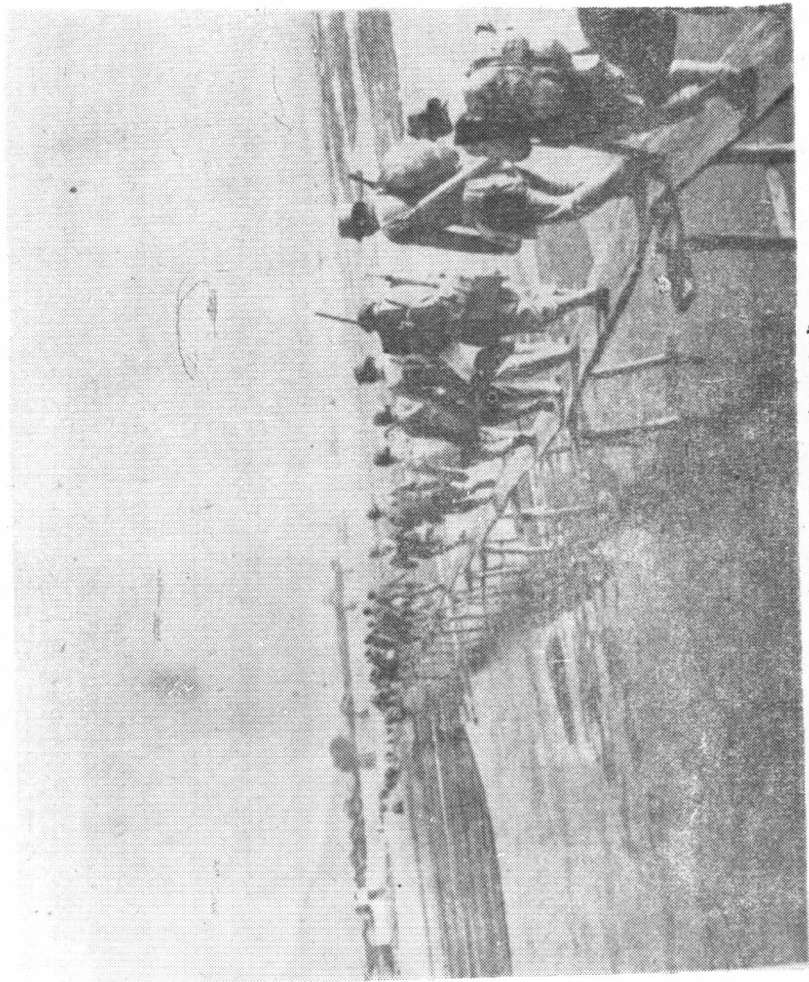
英山革命史资料

第五辑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中共英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1947年刘邓大军进入英山县城

目 录

回 忆 录

- 我的战斗生活……………程贞茂 (4)
回忆英山在抗日高潮中青年党员的作用……………沈杰人 (37)
难忘的记忆……………余正修 (58)
战斗岁月系深情……………王过芳 (69)
南下以后……………王凤舞 (74)

传 记

- 闻伯扶……………汪 滔 (78)
闻维敬……………汪 滔 (80)
樊映淮……………姜佳勋 (82)

资 料

- 早期的英山敦伦祠农民协会……………傅占奎 (87)
英山锄奸记……………钟少熙 (89)
解放战争时期在英山牺牲的外籍烈士调查表……………江健民 (102)

烈士诗词联语

- 挽出征亡故将士……………王孰闻 (113)

挽合肥蔡某某之母·····	王孰闻 (113)
1922年壬戌春联·····	王孰闻 (114)
挽肖侯五叔·····	王孰闻 (114)
挽楹箴五叔·····	王孰闻 (114)
戊午春联·····	王孰闻 (115)
挽叔父·····	王孰闻 (115)
挽段言林·····	王孰闻 (116)
咏英山县两河口塔·····	汪源青 (116)



我的战斗生活

程贞茂

我叫程贞茂，又名王和，生于1913年9月20日。父亲程含德、母亲余氏素以耕织为业。我的父母养有8男2女。我最小，在乡里人们喊我为老八。除三哥程峻三读过书当私塾先生外，其他几个姐姐都是务农纺织。

我的家庭是个佃中农，种有30多担稞的佃田。所谓佃田是买耕种权，每担稞要向东主交一担谷。我家里由于劳动力多，除种田外，多余劳力就帮别人“挑脚”和自己肩挑运转出外做土特产的生意。由于我四哥程克信是一个勤俭治家的能手，全家基本上能够过着温饱的生活。

我小时跟我三哥程峻三和何绪昌先生断断续续读了四年私塾，与余湛是同学。我主要在家放牛，帮助做些农活。到十六七岁时开始学磨粉。因为这是英山土特产，特别是汤粉丝更负盛名，远销东南亚。

1931年，我到武昌磨山给余正泰（英山人）做了两年帮工，学会了做粉丝的全套技术。1936年回到家里在板桥贩租一间茅草房子开小杂货铺子。

初 上 征 途

1937年“七·七”事变，引起了我对国事的关心。特别是，

当我看到武汉《新华日报》上经常介绍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开始认识到要抗日救国只有依靠共产党。只有站在革命人民大众一边，跟着共产党走，祖国才有希望。宁愿死在抗日战场上，不当亡国奴。这样，我就瞒着母亲和妻子同余湛一阵决心去延安。1938年8月上旬即离开家庭，和余湛在金家铺对河杨树塘，住了一晚，再经罗田到团风。因长江沿途敌机轰炸，到武汉没有轮船，我俩即沿江而上，到阳罗才搭上轮船直到汉口。

这时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在从武汉撤往四川，整个武汉三镇人心惶惶。因为英山著名人士吴笑如先生与周恩来同志有联系，我同余湛准备去找他写介绍信去考“抗日军政大学”，一打听，他已离开武汉到重庆去了。这时我和余湛同志感到大失所望。怎么办呢？后来我俩打听到英山的汪牧晋先生与共产党有关系，还住在武昌上边的金口农场。余湛说：“我先去找汪牧晋试试看。”余湛一找到他，他就给余湛开了介绍信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武汉招生委员会”。我见到这个情况，也很快去找汪牧晋先生，汪先生给我也写了介绍信。报到后，我两人参加了考试。考试的程序先是填表，然后主要是口试。口试时，叫我谈一些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看法，问我是否能吃苦，参加革命有没有干一辈子的打算。因为我早已下定了奔赴延安的决心，对组织上提出的问题都答得很好，被录取了。组织上发给了我们被录取的通知和到西安办事处的介绍信。我记得当时抗大武汉招生委员会的主任叫罗明，他告诉我，到了西安后，将介绍信交给西安办事处的罗炳辉。一再嘱咐，一路上要警惕国民党特务的盘查和拦截。这样，我就把介绍信放进布鞋帮里缝好，从汉口乘火车，经郑州，于1938年8月下旬到达了目的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七贤庄。

到了西安后，因要集中成批再赴延安，我和余湛同志又在西安等了几天，直等到有了70多人（其中有两女同志）时，才继

续向延安行进。

抗 大 学 习

西安到延安有800多华里路程，完全要步行，在西安这里，当时虽是8月下旬的天气白天走起路来汗流浹背，到了晚上天气又变得很凉，有时靠不上兵站，就在外露宿。同我一阵的余湛同志，就是这样冷冷热热生了病——拉痢疾，过了宜君县后掉队了。大队走了，我只好跟余湛一阵，照顾一下他，给他雇一头小毛驴，把他扶上毛驴背，走不多远，他又要下来拉稀。就这样上上下下慢慢往前挨，好不容易才到了陕北洛川——八路军留守处。这里驻扎有一个炮团，就把余湛安排在炮兵团卫生所治疗，我负责守候，未去延安。

这时延安抗大在洛川办有六大队，我先到六大队，余湛病好了也到六大队来了。

抗大洛川六大队是1938年9月间正式开办的，大队长是韦国清。余湛和我都编在六大队三队。队长赖光勋，指导员苏牧。我先看到的英山人是吴其迺（即白桦）。他是吴笑如先生的儿子，也从延安来到洛川和我们编在一个队。后来他在四野战军任文工团团长，全国解放后在越南，因遭车祸不幸牺牲。他的儿子吴念华，现在湖南湘潭电机厂工作。

我在洛川从9月——12月，共学习了四个月。在学习中，朱总司令从前线回来参加党中央召开的扩大六中全会，路过洛川，跟我们六大队全体队员讲了话。这是第一次见到朱总司令。

这时，武汉沦陷敌手，我们这些热血青年，人人都感到痛心疾首，义愤填膺。

党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了“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的讲话。全会上还决定将洛川的抗大六大队、陕北公学（驻柞邑）合并东迁敌后。我们于1938年12月开始东进过黄

河，经同蒲路封锁线到晋东南成立抗大一分校。一分校校长是何长工，副校长是周纯全，驻地是晋东南潞城的故县镇。

在我们东迁时，余湛同志被调到延安参谋训练班学习，便和我分开了。他毕业后，就被分到中央机关工作。

我在洛川抗大六大队时，由队长赖光勋，指导员苏牧介绍于1938年11月2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6个月，到1939年在抗大一分校按期转正。我们一起宣誓是4个人，成立一个党小组，组织上指定我为小组长。那时党组织不公开，开会、学习文件都是秘密的。《党章》和“党员如何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之类的小册子，是油印的，发下来互相传看后，再定期召开小组会讨论，小组生活会也是定期召开的。

我加入了党的组织，就象在远方见到母亲一样温暖。有很强的光荣感，处处考虑起模范作用。关心党的事业。

我们原抗大洛川的六大队三队，到一分校编为一支队二队。支队长林铁、政委是杜义德（即后来刘邓大军六纵队政委）。二队政治指导员是吴林焕，苏牧为副指导员。我为第九班班长，吴其迺为第一班班长，夜晚站岗，总是他向我交班。

在抗大一分校二队党支部是我担任民运委员。记得1939年“七一”这天，朱总司令在故县镇的树林里作报告，主要是讲党的历史。分校党支部委员都参加了，听的人很多，朱总司令说：“你们入党比较容易，我当时找党不得其门而入，最后在法国才找到共产党”。这天中午还会了一次餐。

因为我们一分校靠近十八集团军总部，朱总司令还在一支队讲过两次课。左权参谋长也来校作过形势报告。

五 师 岁 月

1939年7月间，我们在抗大五期毕业。我的毕业证上鉴定可当政治指导员。

部队到学校接收分配的学员，我要求到新四军，后来组织上又把我分配到十八集团军政治部民运部，搞民运工作队，下到武乡县农村做民运工作和搞民兵训练。这里在总部附近，总部的一些大会也能参加。我参加总部听过彭德怀的报告。康克清同志是直属队协理员。她检查部队轻装演习时我见过面。

1939年10月间，湖南平江惨案后，新四军要干部，我们一共有32人被分配到华中新四军。我们被组织介绍到河南确山县竹沟新四军留守处。我们32人组织了个临时党支部，我为支部书记。主要任务是要保证这批人安全到达目的地。

我们是随同山东赴延安报告团倪志亮司令员一路，穿的灰军服，佩戴十八集团军的臂章和115师的胸章，沿太行山南下，过黄河，到陇海，经绳池乘车到洛阳办事处，国民党虽在搞磨擦，我们大摇大摆，于11月份顺利地到达竹沟。我们同阵到竹沟的还有在黄冈地区的鲁岱和罗楷等同志。

到了竹沟后，我被分到李先念部——鄂豫挺进纵队司令部任政治指导员，直接进入到鄂豫交界的四望山。因这时我到了湖北，离英山很近，怕连累家庭，将原名程贞茂改为王和。王和合起来即为“程”字。当时认为既改了姓名，又保留了自己本来的“程”姓。所以我在五师时，老人只知道我叫王和。

这时，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政委朱理治，政治部主任是任质斌。鄂豫皖党委书记是陈少敏（即陈大姐），主要活动在鄂中、鄂东、豫南等地。

皖南事变后，鄂豫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这时有鄂东军分区、鄂中军分区、豫南军分区。正规军有十三旅、十四旅，加上遍布在鄂东、鄂中、鄂南的地方部队，整个湖北的大部分地区基本被我们控制。

1940年我被调到五师野战医院当教导员，院长是栗秀珍，是个女同志。我们都住在应城农村徐家河附近的张家冲。这时国民党

毛廷芳的部队，从大洪山出击驻在应城的日本侵略军，有很多伤号。当时我们主张抗日，与国民党讲统一战线，我们主动派人到他们部队接收了二三百伤号过来，在村子里到处摆着草铺，很少的一点药品也是从敌人那里搞来的。由于条件差，这些伤员动不动骂娘，你如果靠近他，他就打。他们好象比皇帝老子还大。结果我想了个办法：亲自到每个住了伤员的山房子里去讲话。我说：“战士们，你们受了伤，很辛苦，我们向你们表示慰问。我告诉你们，这不是国民党的后方医院，我们是共产党新四军的野战医院。你们英勇杀敌负伤，我们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接收你们到这里来治伤的。这里条件有限，只能负责给你们饭吃、养伤，要求过高我们办不到。”我这样讲了以后，加上指导员和护士做工作，他们都乖乖的规矩多了。这些人员伤愈后，都送回五战区。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在统战方面做了些工作。

我原来在家里已结婚，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参加革命后，妻子和孩子先后不久都死了。1940年上半年我与医生洪学懿结婚，生一个女孩叫玉洪。洪学懿牺牲后，我将玉洪托当地王妈寄养，到解放后才找回。玉洪现在长沙工作。

同年秋我被调到五师直属队任政治协理员，分管六个党支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各党支部都设有政治指导员，如高非当时就是指导员。

1941年春，李先念同志由京汉铁路以西到铁路以东的一军分区检查工作，把我也带去了。当时，40团一营教导员聂庆太调走（后牺牲），李司令同我谈话，要我下到40团一营任教导员。记得我第一次参加与敌作战是打驻在麻城西部林店鄂东伪顽的一个大队。这一仗将敌全部歼灭。我是具体负责指挥两道桥战斗，拔除伪顽据点。

秋后五师将地方部队编成安（黄安）麻（麻城）纵队，共两个团，每团辖4个连。我被调安麻纵队任政治处主任。

1942年春，我又被调回一军分区政治部任宣传科长。这时，一分区司令员是罗厚福、副司令员何耀榜，政委是地委书记程坦兼。政治部主任是冷新华，我住抗大时，他是政治教员。

1943年五师在孝感大悟山开办抗大十分校，校长杨焕民，政委郑绍文。校内设有营级队、连级队、教官队。其目的主要是为部队培养营连干部。此外，还有个高级感化队，队长是布凤友，我这时被调到该队任政治指导员兼教员，副指导员是金亦民。这个高级感化队的学员共有100多人，是伪顽部队反正过来的营长、团长，有一个还是副司令员，他们有的还带有老婆、马匹同我们住在麻沟。我的主要任务是讲课。教材是校部编写的。也讲社会发展史、讲共产党的主张和路线、方针、政策，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和转变立场。记得有个叫郭飞的，从国民党过来后通过学习还入了党，五师突围后，到华东当上了团政委。

我们高级感化队属二支队。二支队的队长是许金彪，政委邝林，教育科长是李林。

1944年我参加了鄂豫整风班学习。整风班的负责人是吴皓。当时学习七大文件，都是团以上的干部，我们也参加了，在学习中听了郑位三传达党中央七大会议精神，对我们鼓舞很大。我和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形势问题，认识到抗日战争很快就会取得胜利，我们这次学习，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才结束。

日本宣布投降后，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五师整编部队应付国民党对边区的进攻。王震同志率八路军359旅南下到广东边境，后奉命撤回鄂豫边区。成立中原军区时，359旅为第一纵队，原五师的三个旅为第二纵队。这时我被分配到二纵队政治部任秘书。政治部主任是张树才。整编后的部队向桐柏山区进攻，占领了桐柏县、枣阳县，解放了河南新野县。打襄阳附近双沟镇没有打下。另外还打了几仗都没有打好，整个部队又撤到平汉铁路以东，鄂豫交界的宣化店。二纵队驻扎在宣化店，结果被蒋介石调动大批部队把我们包

围了。这时国共双方派出代表成立调处执行部，我方代表是周恩来同志。五师这里也成立调处32小组，我方代表是王震同志。周恩来带调处小组亲自来宣化店，除公务活动外，整个通宵同中原局领导研究中原突围计划。周恩来同志到宣化店是个大摊子，不仅有国民党的人员，还来了不少美国人，马歇尔也来了。中原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把部队中精明强干的一些人抽出来，带上个记者的符号接待美国人和国民党人员。我这次被抽出来是负责招呼一个电影放映队。他们的整个活动安排都由我负责。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蒋介石大规模地发动内战，我们中原部队想在黄河以南站住脚是比较困难的。

为了准备突围，我们中原军区提前把伤病员和妇女，公开从平汉路疏散到华北解放区。有许多干部是化装走的。

突围的部署是：主力向西突围，王震同志率359旅走在前面，二纵队五师随后经桐柏山进入陕南。皮定均同志率一个支队向东突围，进入苏北。留下张体学同志的一个支队坚持在大别山打游击。

向西的部队1946年6月底开始突围，准备经陕南向陕北靠拢。359旅走在前面，二纵队（五师）在后，当我们的部队在信阳至武胜关这段铁路，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以后，地面上的敌人沿途尾追堵截，天上敌机轰炸。我们从河南淅川县，徒步涉过丹江，沿着红二十五军走过的路线，7月到达山阳附近，王震同志率领359旅回到延安，李先念同志和陈少敏同志化装，由地方党护送到延安。这时接到党中央的指示，五师部队分散在陕南、豫西，由中央派来任陕西省委书记的汪锋同志统一领导建设根据地，将陕南、豫西划分3个军分区和3个地委。

陕南这里地瘠民贫，山多沟大，人烟稀少，部队行动困难，走一条沟得一天，翻一座山得半天。在深沟里走不到几步就要蹚水，大家的脚都烂了。没有吃的以坛罐煮土豆充饥。国民党几十

万兵力，对我们进行围攻堵截。我们部队一分散，敌人就尾随对我们进行“围剿”。敌人到处建立据点，我们的活动常常与敌遭遇，有时我们和敌人平行抢占一个山头。

陕南的老百姓都住在山上，长年累月靠挖“鱼鳞坑”种包谷、红薯为生，衣着破烂。在群众这种穷苦的情况下，敌人还在建有据点的地方，对我们实行“空室清野”，把群众都赶到他们的据点附近，把粮食抢走的抢走了，藏的藏起来，连饭锅、铁罐都拿走了，我们象无水之鱼。

三分区，是我们到了山阳县以东的红花附近才建立的。王力（原陕南地方党的负责人）为三地委书记，专员余益菴，地委组织部长是吴皓。三地委，将陕南的商南西、山阳县东划为商山县，我为商山县长，地委宣传部长兼县委书记。我们的活动地点是竹林关、耀岭河一带，建立了竹林关、耀岭河两个区。竹林关区的区长是方博同志，在一次敌人袭击我们时，腿被打断，不能跑，掉了队；耀岭河区的区长是杨森同志，牺牲了。这两个区内都建立了若干个村政府。余益菴、吴皓始终跟我们县机关一起活动。指挥长罗孟刚，带一个连掩护我们开展工作。

地委为了使我们的县政府有单独的活动能力，地委书记王力从商洛地方游击队调一个班到我们县政府作警卫班。一次住在商南县附近，夜间我睡着了，不料全班战士在班长的率领下，逃回商洛去了，只剩下我和我的警卫员、通讯员3个人了。这个班不是叛变，是离不开他们的家乡——商洛。

1947年元月以后，环境非常恶劣，工作不能开展，我们即跟三分区司令员王海山的部队一阵，转移到豫西的卢氏县附近。我曾几次想返回商山县境内坚持斗争，都未实现，只得继续随分区部队活动。

原五师主力，第一批于1947年元月到了黄河北。1947年3月间，中央指示在豫西的五师部队，继续北渡黄河，进入太岳解放

区。这是第二批北渡黄河。我们是在绳池车站西边，通过陇海铁路的。通过铁路时，同国民党地方部队打了一仗。我们过了铁路、敌人坐火车赶到了，对我们进行堵截。我们在部队的掩护下，全部过了陇海铁路，太岳军区孙司令带部队南渡黄河来接我们，我们安全地北渡黄河进入了太岳军区解放区。在阳城县，孙司令将团以上干部请去会了一次餐，在陕南的艰苦环境下，坚持了9个月，到了解放区，不怕敌人袭击，心情特别愉快，夜晚睡个安稳觉，就很幸福。真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晋冀鲁豫解放区，打“平江战役”，高树勋起了义，黄河以北形势大好。土地改革、人民参军参战都搞得轰轰烈烈。这时，蒋介石对解放区全面进攻失败，即把山东、陕北作为进攻重点。

随 军 南 下

四五月间，五师李先念同志在晋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了总结经验教训。坚持在大别山斗争的张体学同志的部队垮了，他也到华北参加了晋城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延安派刘真来晋城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毛主席说，现在到了战略反攻阶段，仗打得好，三五年全国会胜利；打得不好，十年十五年全国会胜利。总之，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听了毛主席的讲话，感到很兴奋，人人都准备参加大反攻。

这时，刘邓大军正在准备跃进大别山，实行战略大反攻，组织大批干部随大军南下。我是五师干部，知道了这个消息更加兴奋，因为没想到，时间这么短，就要打回老家去。晋城会议没有开完，我就找陈少敏同志，要求随军南下，陈少敏同志同意了。当我们五师的一批干部到了大军区所在地的河北武安县附近

的阳邑，这里陆续集中了大批南下的地方干部。这些干部中，大部分是从华北抽来的，原五师的是少数。在这里，宋任穷、廖承志、滕代远等都向我们作了报告，动员大家随军南下开辟新解放区。

我们随刘邓大军南下的这批干部，番号叫“天池部队”，负责人是刘子厚、刘子久、刘济荪，下属若干个干部队，据说有千多人。我与谭扶平在一个队，谭扶平是队长，我是班长，从南阳邑出发，经邯郸到大名县，然后驻阳谷县待命。这时，刘邓大军已南渡黄河打郛城战役。此战役结束后，“天池部队”才南渡黄河，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天池部队”随六纵队跟刘邓总部一阵，从开封和兰封突过陇海铁路，进入黄泛区。敌人前堵后追，天上敌机轰炸，我们部队为了轻装，丢了不少大炮、车辆，蹚了几天水。

刘邓大军进入黄泛区，陈锡联的三纵队负责左翼。

过了黄泛区，到汝河时，敌人不仅不放松尾追，他们还派815师在汝河南岸重兵堵截。汝河不宽，但水很深，在这紧急关头，刘邓首长亲临汝河岸指挥造浮桥，组织人和牲口进行抢渡。

我们原来耽心淮河难过，到了淮河一看，河宽水不深，徒步就过去了，不算什么。最紧张的要算抢渡汝河。

过了淮河，我们进入大别山河南的新县，部队即向鄂东挺进。大部分县城我们部队一到就解放了，如入无人之境。当时国民党正在进攻山东，大别山敌人的力量非常空虚。

转 战 英 山

“天池部队”到了新县，被分配到各县建立政权。开始任士训被分配到黄陂县，他点名要我去。后来组织上分配干部时，发现我是英山县人，就分配我到英山任县长，谭扶平任县委书记，

组织上并嘱咐我，到了家乡为便于联系群众还是把王和改过来，依然叫程贞茂。

当时我认为分到英山的人太少了，就活动了潘大义（潘振宇）、彭科祥等同志到了英山。我在邀他们到英山时，向他们介绍了英山的情况。我说：“英山好，青山绿水。”大家很高兴。

1947年六七月间，我和我的通讯员余德元，跟进入英山的领导班子一起，共19人由新集出发，经过麻城、新州到了罗田县。这时六纵十八旅解放了罗田。我们到旅部找旅政委李震要武器，他让我们自己去择。我们看到有一屋子枪支，每人拿了一支步枪和一些子弹。19个人全部武装起来了。

英山县，是十八旅五十三团第二营，于1947年9月7日首次解放的。一解放就由旅政治部联络科长路天栋任代理县长，出榜安民。我们是9月11日跟十八旅五十三团政委李震宇一道由罗田到英山的。12日即在县城南门对河皂角树开会，正式成立英山县人民政府，我为县长，并确定在英山西河石头咀一带建立解放区。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因为五十三团有6挺重机枪，带着很笨重，决定埋起来。我连夜将机枪用六七匹骡马驮运到我家。叫开家门，我五哥开门看到我回家了，骡马一大片，吓得说：“这怎么得了啊！”我说：“怕什么，跑反吗。”当即我向一家人讲了形势。我说：“国民党已经快要垮台了。共产党三五年就要在全国取得胜利。目前是困难点，一解放了，大家就会过好日子。”我又说：“我带来的解放军的重机枪，目前不好用，你（指我的五哥）马上挖坑埋起来。”我的几位哥哥同心协力，当夜在屋内挖坑埋了重机关枪。天不亮，我们就带着骡马又回到了县里。

我埋机枪这件事引起了谣言，说我把无数的金银财宝送回了家。说得神乎其神。敌人扫荡后，自卫队到我家挖地三尺，寻找